

他们从闽赣边走上抗日战场

况建军

红军长征后，红军闽赣边贵（溪）南游击队高举革命红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经过艰苦谈判，贵（溪）南游击队走出深山，与兄弟部队一起接受整训后，改编进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并迅速挥师北上，加入华中抗日洪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四军成立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9月下旬，项英、陈毅先后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29日项英、陈毅以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改编，并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派人分头联络各地的红军游击队。

从1937年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问题。会议作出《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分局机关驻南昌；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省汉口太和街26号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于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办公。

大洲和谈

早在1937年初，黄道任书记的中共闽赣省委果断组织起抗日救国会，2月7日又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并很快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8月，中共闽赣省委派出去寻找党的关系的省委委员吴华友辗转寄来中共中央制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红军东进山西宣言》等重要文件，省委立即进行学习研究，一致认为中央的指示精神完全正确。黄道和曾镜冰、曾昭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在闽北地区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建议。9月20日，他们又致函国民党



► 改编为新四军的工农红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战士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希望熊式辉派代表来谈判抗日合作事宜。

在中共闽赣省委努力下，1937年9月底10月初，江西国民党当局终于作出反应，委托福建省光泽县县长高楚衡给中共闽赣省委写信，信中表示愿意进行谈判。接到来信，黄道立即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同意谈判，地点放在福建省光泽县霞阳乡大洲村。中共闽赣省委以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如真、教导大队大队长邱子明为代表，到光泽县大洲村，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福建省光泽县县长高楚衡进行谈判。

中共闽赣省委代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如下条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政治犯”；成立闽赣边区人民政府；划出地方给红军游击队集中休整；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对方要解决给养问题；允许我方派代表去请示中央，对方要保证安全。国民党方面基本接受了这些条件，同意将国民党部队撤出铅山县，划铅山县为红军游击队集中休整地。

国民党代表提出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减租减息等条件，中共闽赣省委考虑到这两条基本上符合中共中央精神，也接受了。谈判结束后次日，黄道、曾镜冰、曾昭铭亲自到大洲同周中诚、高楚衡见面，表示同意谈判达成的协议，希望双方共同遵守，竭诚合作。

10月8日，中共闽赣省委派曾昭铭、曾镜冰先后赴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大洲谈判情况。同时又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叶剑英取得了联系，这样中共闽赣省委终于恢复了同中共中央中断了三年的联系。

资溪谈判

1937年11月，在中共闽赣省委领导下的资（溪）光（泽）贵（溪）红军游击根据地为中心区域资溪县，国民党江西省资溪县县长王思荣迫于抗日形势，派人送信给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联系谈判，谈判地点定在资溪县。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

书记叶金大一起赴资溪县城谈判。当他们来到县城门口时，只见各界民众数百人沿街列队欢迎，鲍永泉借此机会向前来欢迎的民众和国民党资溪县要员作了团结抗日宣传。当天下午，鲍永泉又应邀向资溪县联保主任、保甲长集训班作了抗日形势报告。第二天，双方开始举行正式谈判。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代表提出的共同抗战合作条件是：团结一致，坚决抗日；减少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负担，实行减租减息；反对贪官污吏，提倡廉洁奉公，要给群众抗日救亡的自由，释放我方被捕人员。谈判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进行，但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编入新四军

红军贵南游击队是在中共闽赣省委和所属资、光、贵中心县委领导下，活跃在福建省光泽县、江西省资溪、贵溪县交界区域的一支红军游击队。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极其险恶的处境中坚持斗争。中共闽赣省委与国民党当局和谈达成协议后，贵南红军游击队按照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的指示下山集中。此时，坚持斗争的贵南红军游击队尚有60多位同志，下山前又有40多名革命群众主动加入，一行百余人进驻资溪县昌坪进行整训。

1937年11月，整训后的贵南红军游击队由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书记刘文学带领到达光泽县霞阳乡，在这里参加了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然后根据中共闽赣省委指示，贵南红军游击队由刘文学带领到达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刘文学率游击队下山改编时，留下鲍永泉、叶金大等20余人继续在资、光、贵地区开展活动。

红军贵南游击队集中在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进行改编，大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是统一部队番号，将闽赣边区各支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称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第二步是思想整顿，对部队普遍进行“克服游击主义”“搞

好革命团结”“自觉遵守纪律”等方面的教育；第三步是加强军事训练，做好奔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统一部队的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课目的动作和要领的训练；第四步是扩编队伍，进行紧急动员，组织干部下乡宣传抗日和国共合作，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经过努力，红军游击区很快掀起了参军热潮，其中贵溪南部就有1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

1938年2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张云逸和黄道从南昌军部出发，赴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及闽东地区，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并指导第五、第六团的整编工作。他们于2月9日到达闽赣边游击队集结地石塘镇，于当天在一所学校里举行了五团营以上干部就职仪式。会议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主持，黄道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宣布命令，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政委曾昭铭，参谋长杨元三（未到职，后由桂逢洲接任），政治处主任刘文学。全团编为3个营，1个机炮连，约1500人，700余支枪。一营以饶守坤率领的闽东北红军游击队为主编成，营长严昌荣，副营长桂逢洲；二营以陈仁洪、马长炎所带的红军游击队和贵南红军游击队为主编成，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三营由省委机关直属队和崇安建阳红军游击队为主编成，营长周汝春，副营长阙中一。

1938年2月25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根据新四军司令部的指示，向皖南开拔，奔赴抗日战场。这一天铅山县石塘街的河滩上人山人海，人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送新四军五团北上抗日。五团经河口镇到达横峰县，在横峰举行了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黄道在会上讲话，希望五团全体指战员，发扬革命传统，服从军部和支队的指挥，与兄弟部队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在抗日前线建立新的功勋。随后，这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严峻考验的队伍，离开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

（作者单位：江西省鹰潭市政协）

谭友林智除汉奸

常红



1938年7月底，谭友林奉上级命令，随同彭雪枫等来到位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负责筹办第二期教导队，对全国各地党组织选送的优秀青年进行抗日游击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知识的培训。

同年9月底，以竹沟教导队学员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游击支队。支队在彭雪枫的率领下，从河南确山竹沟出发，抵达西华县杜岗，与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新四军游击支队先遣大队会师。会师后的3支游击队合编，番号仍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3个大队，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10月27日，新四军游击支队渡黄河东进，连连捷报，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939年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豫东鹿邑县白马驿，进行了军政整训。其间，第二大队编为第二团，由滕海潜任团长，谭友林任政委。

不久，第二团奉命进驻萧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中共萧县县委向谭友林反映，该县附近驻扎一支汉奸武装，表面上宣称“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实际上却干着卖国、反共的勾当——当日军“扫荡”时，他们就充当“皇协军”，在津浦路沿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退走后，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向当地老百姓索粮、要饷，因此民愤极大，希望二团出兵将其消灭。谭友林立即派人进行侦察，发现这股汉奸仗着武器精良（有机枪13挺、迫击炮两门），骄

横无比，根本不把新四军放在眼里。谭友林随即主持会议，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利用这股敌人表面上宣称“合作抗日”这一点，采取智取战术，请其首脑前来参加抗日联欢会，并部署在联欢会上将其解决。

汉奸头目接到新四军的邀请后，盘算着如果不去，其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就会被当众戳穿，又想当然地认为己方武器精良，如果在联欢会上突然发难，“吃掉”只有几根“乌銃”的新四军“绰绰有余”，于是在3月15日下午经过“精心布置”后，带着300多人并携带所有重武器（其中50余人暗藏驳壳枪），大摇大摆前往参加联欢会。

汉奸们到会后，谭友林亲自“迎接”，并向汉奸头目“建议”：所有参加联欢的双方官兵，均将随身携带的武器集中到操场中央，双方官兵以排为单位席地混坐。汉奸头目表面上表示同意，暗中命令暗藏手枪的手下伺机刺杀谭友林等领导干部。

当谭友林提出“合影”时，汉奸头目露出反动面目，下令手下向谭友林开枪。谭友林早有准备，一声令下，二团指战员按照既定部署，纷纷拔地而起，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就将操场上敌人的13挺机枪全部夺取，端起来向敌人开火。汉奸头目及其保镖拔枪顽抗，被当场击毙。埋伏在会场外的新四军战士也冲进操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敌人，迫使其全部投降。

此次战斗，二团仅以微弱代价，不仅将对方这股汉奸彻底消灭，并缴获机枪13挺、步枪200余支、驳壳枪50多支、迫击炮两门，大大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被誉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

梁银安



郭好礼，原名郭富堂，1904年8月13日生于河北省临漳县郭小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富堂举起抗日义旗，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秋，郭好礼率部转移到鲁西北地区，和八路军东进纵队协同作战。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郭部不断壮大，发展为4个团6000余人，并夺回了东阿县城。此后，郭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他们通过阴谋诡计，将郭好礼的部队强行遣散。

郭好礼回到临漳县，召集旧部，改编地方民团，组织武装，仍以三支队番号进行抗日活动。有亲戚劝他说：“你在山东混到几千人马都没成功，现在只有这百十多人，还闹腾个啥？”郭好礼笑着问对方：“咱们庄稼人遭了大水，好笑的庄稼没收成，还种不种了？”对方说：“咋不种呢！不种庄稼指望啥过日子？”郭好礼说：“这就对了，我也是失败了再才有指望，不打了日本鬼子，我们还指望啥过日子哩？”1939年6月，中共冀鲁豫特委派人到郭部，组建了党支部。不久，郭好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三支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十三支队，郭好礼任支队长。

1940年春，第三十三支队编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四团，郭好礼任副团长。8月，他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后调任八路军冀南军区轮训队副队长，并组建抗日武装“临安支队”。

郭好礼在战斗中屡受教育，战士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群众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刘型率部参加黄洋界保卫战

吴昌荣



刘型，1906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一个佃农家庭。19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萍乡中学，在此期间，思想进步较快，并与组织了互助社，1926年参加革命并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参加了讨伐军阀的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刘型受组织派遣回家乡江西萍乡，搞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刘型率领萍醴游击营80多名战士奔赴井冈山，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党代表，参加了保卫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8月中旬，刘型接到营部通知，率领部队星夜兼程赶回井冈山。接到任务后，刘型马上回连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并于29日带领一连来到险峻的黄洋界阵地。他察看峻峭地形后，做好作战准备工作，布下了“竹钉阵”“竹篱笆障碍”“滚木擂石”“布满竹钉的壕沟”“石筑的射击掩体”等多道防线。

8月30日清晨，敌人集中了三个团，向黄洋界哨口发起攻击。当敌人进入红军哨口第一道竹钉防线时，刘型即指挥红军战士向敌人一齐射击。敌军乱

作一团，慌忙向小路两旁逃命，企图隐蔽，却被杂草盖着的竹钉刺中，纷纷疼得跳了起来，成了红军的“活靶子”。刘型见状，命令战士们瞄准射击，顿时又击毙了一批敌人。隐蔽在各个山头上的赤卫队、暴动队也同时用单响枪、鸟枪、土制手榴弹向敌人猛打。敌人丢下多具尸体，仓皇败退。

随后，敌人又发起了两次进攻，也被红军击退。下午4时许，敌军在炮火掩护下，集中力量，又一次向黄洋界哨口发起进攻。战斗中，敌军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被一道坚固的竹篱笆挡住了去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拔出一部分，继续往上爬，又踩上了尖刀般的竹钉，痛得乱叫。

刘型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将一块块巨石向敌人投去，砸得敌人鬼哭狼嚎。助战群众也在铁桶里点燃了鞭炮，鞭炮的爆炸声如同机关枪怒射的声音响彻山间。就在敌军不知所措之际，红军战士把从前缴获后在井冈山红军修理厂修理的一门敌军的迫击炮抬到黄洋界上，向敌军发射了3发炮弹。第三发炮弹正好在敌军的指挥所附近爆炸。敌军见红军有大炮轰击，认定红军主力已返回井冈山，吓得魂飞胆丧。当夜，在云雾弥漫之下，敌军全部逃之夭夭，沿途又遭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袭击，于是连夜逃到湖南酃县，不敢再犯井冈山。

取叙府，护国军兵贵神速

贾晓明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同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宣布云南独立起义，随即正式成立云南都督府和组织护国军，由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并决定护国军编为3个军，第一军为护国军的主攻部队，由蔡锷任总司令，统军向四川挺进。

护国军以第一军第一梯团的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为先遣队，在云南宣布独立起义前就以剿匪名义，经昭通、盐津向四川方向移动。为了策动、组织起义，号召四川军民协同云南护国军讨袁，在蔡锷的邀请下，川籍革命党人熊克武、但懋辛等随先遣队出发。

1916年1月15日，先遣队经过多日徒步行军，抵达四川的新场地带。一路上，熊克武、但懋辛等一面与当地居民联系，侦察敌情；一面宣传揭露袁世凯要做皇帝、背叛民国，起义军要讨伐袁世凯的道理。沿途群众欢欣鼓舞，有些自告奋勇给护国军当向导。

17日清晨，护国军第一梯团集中了四个连队，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向据守滩头、燕子坡等地的北洋军发起猛烈攻击。护国军士气旺盛，又调集炮队轰击敌人阵地，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军防线突破，进占滩头、燕子坡，接着又夺取凤米场、捧印村等地。经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工作，川南不少地方武装携带武器，加入到护国军的行列中。

北洋军退至横江下游的横江镇设防，又急派援军一个混成团赶到距横江20里的黄桷树据据守。1月18日，护国军第一梯团从燕子坡、捧印村出动，于下午3时逼近黄桷树敌人防线，分两翼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军不支，残部败退横江。护国军乘胜追击，横江守敌抵抗片刻，便纷纷乘船沿金沙江向安边镇逃去。护国军于1月18日夜间占领了横江，俘虏了殿后敌人数十人，缴获大炮两门，机枪4挺及枪械、军需物资两船，

并迅速进军安边镇。

安边镇位于金沙江和横江合口的北岸，东距叙府40多里，背山面水，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由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主力驻守。护国军到达安边镇外的金沙江南岸时，北洋军已经在北岸修筑了工事，封锁了渡口附近江面，并强迫沿江的民船集中到北岸。

对此，护国军第一梯团团长刘云峰和支队长邓泰中、杨泰，根据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决定采用“远道迂回”的战术：第一支队隔江发起佯攻，牵制敌人兵力；第二支队秘密前往金沙江上游一带渡江，直插守敌背后，和第一支队前后夹击安边。第二支队出发后，第一支队在熊克武、但懋辛的指导下向对岸守敌开炮、射击。入夜，但懋辛听到敌人的枪炮声减弱，感到江岸敌人有可能连夜撤退，于是派出在当地新招募的数名战士，从小渡口秘密过江侦察，果然发现江边敌人已经向安边镇逃走。这